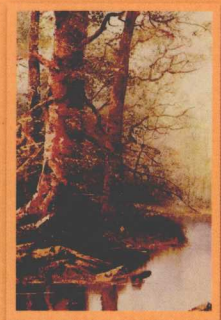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Its Folk Roots and
Modern Literary Branches*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 其民间溯源与现代文学发展

Bernard W. Bel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Its Folk Roots and
Modern Literary Branches*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 其民间溯源与现代文学发展

Bernard W. Bel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6-1007

© 2004 b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 =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其民间溯源与现代文学发展 / 贝尔(Bell, Bernard W.)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英美文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当… II. 贝… III. 美国黑人—小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英文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526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人: 姚 虹

责任编辑: 徐 宁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3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守仁	王逢振	区 钨
毛思慧	石 坚	申 丹	宁一中
吕大年	朱 刚	刘建华	刘象愚
刘意青	阮 炜	苏耕欣	杜瑞清
李公昭	李文俊	杨仁敬	肖明翰
吴 冰	何其莘	张子清	张在新
张 冲	张伯香	张 剑	张 耘
陆建德	金 莉	周小仪	胡家峦
侯毅凌	姚乃强	殷企平	郭棲庆
陶 洁	黄 梅	盛 宁	董衡巽
韩敏中	程锡麟	虞建华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 青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黑人文学（学术术语“非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分支，在20世纪后半叶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黑人文学与女性文学、少数裔文学、同性恋文学一样，从边缘一下子跳到中心；大学里纷纷建立专门的非裔文学系、研究中心，招聘专门的非裔文学教授（当然基本上都是黑人学者），课程设置上辟有专门的研究专题——总之，在政府法律（“平等权利法案”¹）和大众意识（“政治正确”）的推动下，非裔美国文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学，成为各种美国文学选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记得七年前我在哈佛大学写作《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时，同样出于“政治正确”的心态，要给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黑人文学辟出专章。苦于这个时期的美国黑人文学尚未崭露头角，我特地煞费苦心，把该章的名称定为“有关美国黑人的文学”，这样，一是把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最突出的“身份”（identity）问题（马克·吐温、惠特曼、迪更生等形成的美国文学自身的身份，以及美国女性文学的出现和初具雏形）和美国黑人文学的显现联系起来，二是把美国内战中的黑人问题和美国文学中对黑人的表征联系起来，勾勒出一幅美国黑人文学从第一代自传和奴隶叙事到第二代建设黑人文学身份和小说传统的发展图景。

进入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文学得到极大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以黑人小说最具有代表性——小说是最适于表达族裔心声的文学载体。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贝尔

“平等权利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女性等，后来被一厢情愿地引申到同性恋等新的“边缘群体”）争取平等的教育及就业机会，其中备受争议的是所谓的定额制（即在政府部门招聘雇员或公立学校招生时，为少数族裔留下一定的名额）。很多白人反对这项法案，称之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好几位法官将“反向歧视”定义为保护对象并不“分散和孤立”，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因此“平等权利法案”也属于“嫌疑归类”。不过顾及到自由主义的声势，在实际判案中，多数法官对“嫌疑归类”的审查并不那么严格。但是，“法官的任务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日益右倾、政治氛围愈加趋向保守的今天，“平等权利法案”还能走多远需要拭目以待。

(Bernard W. Bell) 撰写的《当代非裔美国小说：其民间溯源与现代文学发展》(*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Its Folk Roots and Modern Literary Branches*, 以下简称《当代非裔美国小说》)，对这段时期的黑人小说创作和主要的黑人小说家作了全面的研究，对黑人小说的创作手法、黑人小说美学、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对黑人小说创作的影响、黑人小说的特点，都作了很好的理论梳理和文本分析，反映了美国学术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体现了美国黑人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是贝尔 1987 年出版的《非裔美国小说及其传统》的后续篇，评述了 100 多位非裔小说家和 1962 年至 2001 年间出版的 200 余部黑人小说。这部著作出版后得到美国学术界的认可，获得年度杰出学术专著奖和 2006 年美国图书奖。哈佛大学著名黑人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把它称为“一位主要学者完成的一个主要成果”。威斯康星大学内莉·麦凯教授认为，“贝尔从历史上的地方和口头传统一直谈到当代神秘小说和传奇故事，带着我们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进入现代主义，从后结构主义进入多元文化和社区中出现的身份与美国中心的各种比喻。他的阅读有洞见，启人深思。……通观全书，作者思路清晰，语言准确，任何认真研究非裔美国小说的学生都必得一读”。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虽然论述的时间自 1962 年开始，但是涉及的内容上至 19 世纪 50 年代，下至 21 世纪初，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其中对 1983 年至 2001 年间美国黑人小说和传奇的评述资料新，尤其值得国内研究者一读。此书第一章主要涉及术语和概念（政治、文学、批评理论）的界定，尤其是对“欧洲中心论”、“非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的讨论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紧扣美国黑人作家这个议题，显示了这些概念对黑人文学研究来说的长处与不足（如他对德里达和赛义德这些“白人”学术权威的分析¹）。虽然贝尔提出了取代的方法（“后殖民非裔美国中心新男性理论”），但也流露出黑人学者的几多无奈，值得仔细品味。第二至第五章是《非裔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一书第一至第八章的总结和归纳，其中的第二、第三两章讲述的是 1853 年至 1962 年美国黑人小说的总体发展，是对百年黑人文学（不同时期的“高峰”和“低谷”）很好的梳理，之中对“黑之根”（即国内学者常常论及的黑人文学的“黑人性”问题）的叙述，着眼于非裔口头叙述（African oral narrative roots）和民间传说（African American folk roots），篇幅不长，论述却十分精要到位。

1 尽管赛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德里达有犹太裔身份，但是他们的确已经成为西方白人学术界（所谓的“WASP”）的权威。

此外，对拉尔夫·埃利森“双重意识”和“双重视角”的论述对理解整个黑人文学很有帮助。第四、第五章把时间拉到了1962年至1983年这个左翼时代，结合“黑色权利”、“黑色艺术”、“黑人女性主义”等思潮，进一步阐释《非裔美国小说及其传统》涉及的美国黑人小说中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创作思潮，对这个时期出版的40余部黑人小说和主要的黑人小说家进行了评述，包括我们熟悉的黑人文学第二、第三次高潮中的代表人物艾丽斯·沃克、托妮·莫里森和伊什梅尔·里德。第六至第八章是贝尔的新作。理论部分主要涉及当代黑人美学（第六章）和新黑人美学（第七章），议题包括离散族裔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和非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和族群意识，作品作家分析涉及1983年至2001年出版的黑人小说以及这一期间崭露头角的小说家，绝大部分在中国尚未见提及。第八章论及的主要是黑人作家创作的次文类（*paraliterature*）作品，如科幻小说、同性恋小说，以及侦探小说。

贝尔1962年和1966年在霍华德大学英语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70年在马萨诸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年从事美国黑人文学的教学和研究，2004年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富布赖特教授。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黑人文学，著述包括《当代非洲离散族群文学》（1997）、《呼喊与回应：河滨非裔美国文学传统选集》（1997）、《杜波伊斯论种族和文化》（1996）、《非裔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989）、《现当代非裔美国诗歌》（1972），以及大量论文。目前他正在编写《当代非裔美国诗歌的民间溯源》。

在美国少数裔文学研究中有一个认同，即少数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者本人的生活经历（*lived experience*），没有类似经历的局外人其研究的可信度要大打折扣：同情者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尤其是无法深入文本，在字里行间感受体会其深层蕴意。¹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尔的确是最有资格（因此也是最可信）的美国黑人文学研究者。

贝尔成长在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种族隔离的环境之下。在黑人社区中的黑人学校，其课程设置、教学设施、课本质量都不可与白人学校相比。即使在这样的学校，他也被强行要求“纠正”自己的黑人语言和发音。课余时间他

1 因此，男性是否有资格做女性主义研究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建立在普式价值观上的同情和理解并不一定能和女性的独特感受产生深层次共鸣；同样的说法也出现在同性恋文学研究中，至少同性恋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圈内之人”，这些研究有赖于相关的生活体验。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尚存争议，因为如此说来，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有资格做以上的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国内相当部分的非裔和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确是一厢情愿的阅读，与美国黑人和华裔的真实体验相去甚远。

做过各种零工：送菜、擦鞋、洗车、洗鱼，干过偷窃，为赌徒望过风。他出身在单亲家庭，母亲靠救济金生活，度日艰难。但是母亲仍然要他阅读保罗·劳伦斯·邓巴、兰斯顿·休斯、路易莎·奥尔科特、马克·吐温这些名家的作品，培养他的族裔意识。他说，自己的经验来自美国社会的下层黑人社区：黑人理发店、黑人教堂仪式、地下室聚会、亲朋野炊、水果采摘、伐木远足等。这些南部黑人文化的熏陶，是他获得黑人知识的主要途径，铸就了他灵魂中的“黑人性”和研究中的“黑人性”。

作为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得以进入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成为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读书期间，他深受拉尔夫·埃利森和法农的影响，形成很强的后殖民意识。他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学生运动，70年代在马萨诸塞大学发起成立杜波依斯非裔美国研究系并任代理系主任，参与建立黑人教师协会并任首届会长，建立少数裔教师协会，促进非白人教员的聘用、留校、教职升迁。1991年他到宾州大学后，积极发展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使那里的该学科在美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贝尔称自己为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更具体的称呼是“改写式的非裔美国中心本土文化文学批评家”（revisionist African Americentric vernacular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即那种只认真理、敢于直言、肩负责任，为自己的群体奔走呼喊，对各种权威说“不”的人，那种立足本族裔、纠正误读误现的学者。

他的研究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双重意识和杂糅身份，采用修辞的、辩证的、对话式的阅读来“重新审视和建构在美国依传统划分的黑人白人文化”，尤其是这两种文化的语言和文学传统，但是并不把它们看作孤立的、静态的、相互排斥的，而是既相异又相通。美国黑人文学于是就具备了“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社会既合作又斗争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特征”。因此，他致力于这样一种美学，即“用想象的方式对美国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体系隐秘的当代语言和其他机构表现提出挑战并力图改变之”。在白人当权者和被压迫阶层的某些人既冲突又合谋、控制了历史书写的情况下，再现黑人文本的种族背景，展现其阶级属性、主观立场和客观表现，张扬之前受到排挤的主张修正历史的非裔美国人文社会学者，贝尔感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贝尔虽然承认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它加以积极利用，同时却对它的一味消解策略持有戒心，因为这种“哲学立场”把个人身份说成既非自然又非文化的产物：黑人奴隶“只是肤色黑而已，其他和白人毫无二致”，这种说法无异于彻底颠覆了“黑人性”。作为“黑人非洲中

心主义者”和“本土理论家”，贝尔采纳的是“人类学立场”，即黑人身份是不容抹煞的独特文化现象，是文化和自然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复杂辩证过程，得益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裔文化传承，涉及肤色、族裔、性别、地缘、文化、性取向、意识等诸多因素。异言之，他仍然坚持“非裔美国中心论”，突出“黑人性”：“在从奴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反讽与戏仿、悲喜剧手法与幽默、含混与矛盾、隔离与混杂、顺从与反抗仍然是双重意识、带有黑人差异的重复、非裔美国文化和性格的明显特征”。他的目的是要显示黑人作品的“真实性、权威性、代表性”，肯定“他们的人性、对欺压的反抗，为他们争取完全的公民尊严权利”。这里，贝尔实际上采纳的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 20 世纪 70 年代对后结构主义既批判又包容的做法，把黑人小说作为“时间空间特定的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政治与叙事话语社会象征行为”：遵循黑人口头文学传统（黑人演讲、神话、传说、故事、音乐、歌曲），坚持“策略上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同时依照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和双重视角，突出黑人的“反抗话语”（oppositional discourse）。

这也是《当代非裔美国小说》的最大特点：既考虑到黑人小说的复杂性、多元性、杂糅性，通过广泛的题材（黑人同性恋文学、传奇故事、小说、科幻作品、侦探小说等），反映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种族下的黑人的真实境况，显示美国南部乡村和北部城市的各种黑人文化的交融汇集，又坚持辩证思维，通过历时与共时交叉、过去与当今呼应，集中讨论黑人小说的审美特征，重点突显黑人的本质（essentialism）。

但是和詹明信一样，贝尔也面临如何处理宏大叙事的尴尬，因为后结构主义和本质主义水火不相容，理论上很难沟通。和詹明信当年的革命时代不同，贝尔面对的是一个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理论上更艰难，社会现实也更严酷。里根-撒切尔-老布什当政以来，英美社会全面向右转，保守主义“回潮”（backlash）愈加明显，贝尔依赖的后现代理论很难继续施展其“批判性”。而且，黑人文学的社会根基也在发生变化：民权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黑人在团结意识、种族自豪感上不如上一辈，坐享天下太平，对种族平等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很多有色人心理上内化了种族歧视：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时，48% 的拉美裔美国人自我认同为白人，瞧不起海地裔美国人。¹ 1991 年的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事件才使许多非裔美国人第一

1 这和现当代批评理论的境遇十分相似：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美国存在一个不断庞大的中产阶级，即美国梦阶层，从中产生出一大批独立和批判意识很强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但是 20 世纪末这个阶层几乎不复存在了，批评理论因此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活动家和追随者，导致目前议论颇多的所谓“理论的死亡”。

次意识到这个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仇恨依然那么根深蒂固。¹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出版于2004年，里面提及黑人学者小盖茨早年的一次经历。20世纪60年代他在耶鲁大学遇到“褐色纸袋”事件：学生聚会时门口挂个褐色纸袋，凡肤色比纸袋更深的学生不得入内。贝尔评论道，现在这种情况不会有了，出现的倒是相反的情况：思想不够“黑”的人得不到认同。但是贝尔的确意识到这种乐观正在消失，因为媒体和学术界开始出现反女性、反黑人、反多元文化和后现代主义，重新拾起所谓的文学经典的声音。²这种思潮可以用2006年4月27日《纽约时报》“专栏编辑”文章《多元文化的末日》加以说明。文章作者认为，“左翼思潮”只是一群女性主义者、黑人、同性恋的喧嚣，不能代表美国大众。今天的女中豪杰或者黑人领袖看上去倒是“旧日电影里的休闲服饰”，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因为“过去几年中，多元文化已如明日黄花”。曾经力挺多元文化的民主党意识到，竞选时少数族裔远不如白人蓝领说话算数，后者感兴趣的是个人的钱包经济，而不是平等和歧视。最主要的是，“9·11”之后，美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大增，不屑于多元文化的“小圈子利益”，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当今的美国社会，隐隐给人一种似乎回到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的感觉，难怪《多元文化的末日》最后以“欢迎你，哈里·杜鲁门”一语结束。

贝尔在《当代非裔美国小说》的扉页上转引一句诗人艾略特的话：“一个

1 1991年3月3日，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以驾车超速为由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殴打场面被旁观者录下，在全国电视台播放。法庭在审判时重播了当时的施暴场面，但是被告（警察）律师以审查事件的全过程为由要求将录像定格后逐一播放，于是警察施暴的连续过程变成了一个个互不连接的单镜头，从这些静态的、单一的镜头中的确无法断定被打的金在那一刻是否真的放弃了反抗（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10）。既然无法判定，于是警察就有了“制服”金的需要。施暴被说成自卫，施暴者1992年4月29日被判无罪释放，于是导致洛杉矶发生大火和种族骚乱，5月1日才平息。

2 的确，儒雅文化来势凶猛，力图拆除后结构主义“政治正确的庙堂”，消除多元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族裔研究等“十字军运动”造成的“邪恶”影响，把被“传媒大学”（mediaversity）搞乱的传统恢复成昔日的文学圣殿（university）。（哈罗德·布鲁姆：“中文版绪言”，《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1-3页）。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赛义德去世前已经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为“人文的堕落”。他疾呼：去除浮躁情绪，回复旧日的细读传统，培养基本功扎实的“文学家”。（“Restoring Intellectual Coherence”，*MLA Newsletter*. Spring, 1999）赛义德个人可以去耶路撒冷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头，以示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他不得不顾忌到保守主义的压力：“理论”只能是学术，不是石头。

作家要想显示地方性同时又不奢望全球性，并不难做到；但是如果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只想全球性而放弃地方性，恐怕做不到。”艾略特这里谈论的还是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但是贝尔喻指的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使用的一个格言：“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据说这句格言来自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说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另一个来自中国的类似格言就是前面提及的“政治正确”）。贝尔大概是想说明，《当代非裔美国小说》既要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站住脚，得到学术界主流的认可，又要牢牢把握黑人非洲中心主义或者非裔美国中心主义，充分张扬黑人文学的特点。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成功，尽管面对严峻的现实，贝尔教授依然任重而道远。

朱 刚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当代非裔美国小说

导 读

*To Carrie, my wife, whose love has been the inspiration
and bedrock of my fulfillment as a man and scholar activist;
and to Byron, Christopher, and Douglass, my sons,
to whom I pass on the lessons of our historical struggle with
double consciousness and for liberty, literacy, and wholeness
as African American men, with my blessings for
successful lives of principle and purpose.*

Memoir
On Becoming an African American
Scholar Activist

EVERYTHING now, we must assume, is in our hands," African American gay novelist, playwright, and essayist James Baldwin reminded us in the biblical and black spiritual jeremiad at the end of *The Fire Next Time* (1963); "we have no right to assume otherwise. If we—and now I mean the relatively conscious whites and the relatively conscious blacks, who must, like lovers, insist on, or cre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others—do not falter in our duty now, we may be able, handful that we are, to end the racial nightmare and achieve our country, and chang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¹ Like many black American men of the pre-World War II generation who are what some readers of Marxist Antonio Gramsci's *Prison Notebooks* (1971) might call organic intellectuals² and agents of social change, my soul looks back in wonder how we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got over the life crises of our sociohistorical separation from primary communities, our socio-psychological transitional experience with hybrid identities, and our ultimate sociocultural reincorporation.³

In our rites of passage many of us have come this far mainly by faith, resourcefulness, and resilience in challenging the legacy of slavery and social hierarchy that subjected and continues in many ways to subject Negroes with one drop of black blood, especially those whose skin was darker than a brown paper bag, to racial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For example, in *The Future of the Race* (1996), Henry Louis Gates Jr., the distinguished brown-skinned critic and chair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tells this story about the brown paper bag ritual that he encountered as a student at Yale in the 1960s:

Some of the brothers who came from private schools in New Orleans held a "bag party." As a classmate explained it to me, a bag party was a New Orleans custom wherein a brown paper bag was stuck on the door. Anyone darker than the bag was denied entrance. That was one cultural legacy that would be put to rest in a hurry—we all made sure of that. But in a manner of speaking, it was replaced by an opposite test whereby those

On Becoming an African American Scholar Activist

who were deemed “not black enough” ideologically were to be shunned. I was not so sure this was an improvement.⁴

Thus, African Americans, especially native-born male intellectuals and agents of progressive social change, owe an immense debt to our primary racial, ethnic, and national communities. We are especially obligated to the ancestors and elders on whose shoulders we stand, for ou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urvival strategies for reconciling our double consciousness (dual ra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for our distinctive vernacular theories of a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liberty shows that all concessions, yet made to her august claims, have been born of earnest struggle. . . . This struggle,” Frederick Douglass wrote in a letter to white abolitionist Gerrit Smith in 1849, “may be a moral one; or it may be a physical one; or it may be both moral and physical; but it must be a struggle.”⁵ When I was a latchkey kid in grammar school during World War II, I would occasionally upset my brown-skinned, working-class, single mother by visiting my equally brown-skinned but estranged father and my short, wiry, witty paternal grandfather, who lived at 1915 North Capitol Street, only two blocks from my school in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Although I rarely saw my father during these after school visits and never developed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Grandpa Weaver loved to tell me stories, and I loved to listen. Often, these stories would be about his strategies for resisting antiblack racism in the army during World War I and in his everyday experiences with the tragicomic ironies of “separate but equal”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army and the nation’s capital. Wryly critical of the ways of black and white folks, he sometimes began the stories with the same popular black folk saying: “If you’re white, you’re alright. If you’re brown, stick around. But if you’re black, oh brother, get back, get back!” Underscoring the fact that most folks in our primary speech community knew from their everyday experiences that racial prejudice and segregation actually meant an unequal and unjust division of power, privilege, preference, and resources, he would usually close the storytelling sessions in his living-room or on the front porch of his two-story red brick home with the trenchant vernacular moral lesson of courage, resilience, and resourcefulness: “ ‘Member, son, it takes shit, grit, and motherwit to survive in dis man’s world.”

Also, before migrating to Harlem and the South Bronx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y mother and I used to make frequent visits to kinfolks outside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n Norbeck, Maryland,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Usually during these visits, my mother’s oldest and most maternal sister, Aunt Gretna, would affectionately call me “Benniewix” and welcome me with a big hug before strengthening our family bond with my favorite communal and spiritual ritual. While she was baking bread in the oven of a huge wood-burning stove in her equally huge kitchen, she would tell me and her daughter, Little Gretna,

On Becoming an African American Scholar Activist

who was a year younger than I, stories about having Jesus in our lives, and she would hum spirituals. After taking two or three pans out of the oven and piling butter on the big, fluffy, golden brown chunks of hot white bread for us, she would say: "Don't y'all forget yo blessing. And 'member, de Lord helps dem dat helps demselves." Her tall, dark-skinned husband, Uncle Jim, a construction worker and the protector and provider of the family who, unlike my Uncles Angel and David, brought his paycheck home every Friday and with whom she shared authority, would sometimes walk through the kitchen on these occasions. When he overheard her, he would say in his usual soft-spoken manner with a smile on his face, "Ya think long, ya think wrong," reminding us that she didn't mean for us to help ourselves to another chunk of bread without her permission. These anecdotes are examples of the bidialectalism and residually oral form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roots of my authenticity, authority, and agency, key terms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ly, predominantly, or exclusively black America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rimary reference group orientation that will be defined more fully in chapter 1. These are the socio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roots of my double consciousness, ambivalence, and code-switching as a modern African American organic intellectual as well as an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critic, literary scholar, and social activist in the tradition of W. E. B. Du Bois and Sterling A. Brown, two of my elders, ancestors, and primary intellectual role models.

Grounded in the specific experiences of enslaved black people of primarily West and Central African ancestry and culture with antiblack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⁶ and in the hybrid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African American folk and vernacular tradition,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 Its Folk Roots and Modern Literary Branches* is a sequel to *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1987). The hybridity of African American folk and our vernacular tradition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in South Carolina, the Georgia Sea Islands, and Louisiana that have been transplanted and that have developed contemporary branches nationally, especially in Northern and Midwestern industrialized cities. In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3), Great Barrington-born W. E. B. Du Bois, who bore witness as a visibly mixed black New England Brahmin to the lives of black peasants, sharecroppers, and farmers as a teacher in Tennessee and who wrote a thesis on it as a doctoral student in Berlin, identifies the folk struggling up from slavery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the black artisan."⁷ In *The New Negro* (1925), Philadelphia-born Alain Locke, a similarly light-skinned black intellectual educated at Harvard and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calls the modern transplanted and transformed folk of Harlem in the 1920s "the New Negro," "the migrant masses," and "the Negro . . . peasant matrix of that section of America that has most undervalued him." In *The Big Sea* (1940), the light-skinned black poet Langston Hughes, born in Joplin, Missouri, and educated at Lincoln ("black Princeton") University, simply refers to the folk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 as "ordinary Negroes."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reminds us